

中国式现代化对非洲发展及中非合作的启示*

李 丹 王丽君

【内容提要】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现代化作为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对全球发展事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可为与中国有历史、现实、理论、情感等逻辑上内洽的非洲国家提供借鉴。非洲国家现代化发展需以减贫发展为首要，以工业基建为重点，以科技教育为支撑，以自主发展为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须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发展伙伴关系、促进中非农工商贸产业融合、增强中非可持续发展潜力、提升中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

【作者简介】李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王丽君，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361005）。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破解各种难题的关键钥匙。2000 年“千年发展目标”（MDGs）提出“推动全球合作促进发展”，2015 年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以包容性方式实现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2021 年“全球发展倡议”强调“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议题。对非洲大陆而言，其

*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基金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研究”（FJ2023Z010）的阶段性成果。

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对外关系问题,本质上都与发展问题相关联。发展问题是这块大陆所有问题的纽结、焦点与源头。^①作为国际发展的主流路径,现代化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摆脱落后、实现发展的共同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也为非洲发展和中非合作提供了借鉴。2013年,习近平在出访坦桑尼亚期间首次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断,使中非超过26亿人的命运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表示“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式现代化或可为中非合作提供更多发展增长点,助力构建新时代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发展进程实现新突破。

一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内洽

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在2023年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做非洲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地区层面的具体化、在合作领域的深入化,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互利共赢、互促互进的有机联系整体,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相呼应,具有内洽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情感逻辑。

(一) 历史逻辑:在继往开来中追求发展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程,其形成非一时之力可为,所

① 刘鸿武:《国际思想竞争与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4期,第95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第18~19页。

③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2版。

推动的也非一时之效。中非的发展有着长期、深厚的历史积淀，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虽是对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响应，但也并非突如其来的构想。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中非陆路通道被全程打通，两地开始进行贸易往来。随着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唐宋时期便已开辟了中非直达航线。^① 元代中国与非洲的海上交通可分为至北非、至东非沿岸、至马达加斯加岛这三条航线，中国人对非洲南部的知识随之增加。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其中四访非洲，进一步增进了中非间的认识与了解。^② 在历史沉浮中，中非间的直接往来与贸易虽受到过冲击，但间接贸易从未停止。

没有摆脱依附地位的国家难以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真正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双方开始紧密联系，以寻求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受压迫民族纷纷独立，以期探寻自身发展。新中国一成立就站在亚非拉国家一边，坚定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得到与会亚非国家的认同，万隆精神后来也成了中非关系的核心支柱。1956年5月30日，新中国和埃及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拉开了中非现代外交的序幕。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10个非洲国家，并在访问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和非洲的真诚友谊。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非友好合作更加贴近双方发展实际。中国适时调整了对非援助模式，从一开始多为不求回报的单方给予，逐渐将援助与贸易和投资结合为一体，探索出互利合作模式。1978年，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贸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③ 1978年至1998年，4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中国22位领导人对非洲国家多次进行友好访问。^④ 从1991年起，中国外长连续33年选择非洲作

①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8, pp. 2-3.

②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51~7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12页。

④ 戴严：《邓小平外交思想与中非关系》，《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8月21日，第1版。

为新年出访的第一站。

(二) 现实逻辑：在互利共赢中把握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结合中国自身发展特色的情境下不断形成的，非洲各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各具发展特点。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需要结合双方特色，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取得现代化成果。迈入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的设立为加强中非伙伴关系提供了沟通渠道，成为协调中非关系的理想机构，^①也成为推动中非合作不断向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论坛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为中非发展合作提供了前瞻性指导，鼓励和支持中非地方政府、高校、企业、青年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经验交流与务实合作，不断赋予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新的时代使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非合作不断朝着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方向发展，众多港口和铁路线的开发已成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中非之间存在彼此补益和互惠的空间，使得双方在此长彼短的领域有形成优势互补的可能。一方面，中非关系的加强可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的后续保证；另一方面，非洲也可通过大力发展中非关系得到发展资金、技术和经验，并使其原料出口多元化，同时在开发自有资源的过程中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互利共赢原则作为中非在处理共同发展问题上的基本遵循，促使双方在合作中不断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推动构建中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非积极将各个领域的互补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资源、技术、经贸等领域构建起了无数的利益交汇点，有力促使中非发展合作不断深化。

除却上述长期性的现实基础，突发性的现实考验更凸显了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尤其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公共卫生安全遭到严重挑战的特殊背景下，中国是第一批向非洲捐赠疫苗的国家之一，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医疗队为非洲提供各项援助。^②中国还专门组建了远程专家指导团队，通过召开远程视频会议的方式与非洲54个国家开

① Ambrosé Du Plessis,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deas and Aid: National Interest (s) or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sight on Africa*, Vol. 6, No. 2, 2014, p. 122.

② Folashadé Soulé, “Mapping the Future of Africa-China Relations: Insights from West Africa”,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330, 2021, pp. 7-8.

展技术交流，针对新冠疫情在非洲各国的不同发展程度，采取针对性的援助办法。总体而言，中非具有构建发展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托、能力与需求，既是主动作为，也是顺势而为。

（三）理论逻辑：在开放合作中推动发展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闭关锁国的现代化，而是要在对外开放中和其他国家进行深度交往。^①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同世界各国开展平等的交流合作，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② 不以损害他国利益谋求自身发展。非洲国家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发展共识、发展利益和发展空间，双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增进了解，紧抓发展重点，将中国梦与非洲梦进行有机结合，以现代化成果推动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以该共同体的构建助推双方现代化进程。

“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③ 构建发展命运共同体符合中非各国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非一直互帮互助、同舟共济，中国将为非洲减贫发展、就业创收、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的努力”。^④ 在长久的开放合作中，中国帮助非洲突破发展瓶颈，成为非洲发展的可靠朋友。无论是在基建、农业、工业、电商等产业，还是在卫生、教育、科技、环保等领域，中国都提供了大力支持，为非洲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工业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将中国式现代化、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非洲各国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中非与全球共同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成一体，是中非抱团取暖、携手同行共谋发展合作、共促民生福祉的体现，是双方发展合作深化的必然，极大地拓展了中非发展空间，挖掘了双方合作潜力，对推进全球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中非关系深化发展历程见表1。

-
- ① 贾磊：《论中国式现代化对四重张力的超越克服》，《理论建设》2023年第3期，第15页。
 - ② 刘卓红：《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人民论坛》2021年第24期，第15页。
 - ③ 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297页。
 -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450页。

表1 中非关系深化发展历程

时间	场合	中非关系定位	内涵
2000年	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中非新型伙伴关系	长期稳定、平等互利
2006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
2013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非期间演讲	中非命运共同体	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真实亲诚、正确义利观
2015年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
2018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
2021年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坚持团结抗疫、深化务实合作、推进绿色发展、维护公平正义
2023年	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共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共同维护和平安全的全球环境、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四) 情感逻辑：在同舟共济中稳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桎梏，推动着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用真心真情为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情感支撑。毛泽东、周恩来在非洲享有崇高威望，不仅因他们立场鲜明地把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看作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伟大斗争”，也因他们发自内心地把非洲人民当作“自己人”，切实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中非在同帝国主义和殖民大国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建立了深厚而真诚的友谊。^①中国历来崇尚和平，始终坚定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并积极维护全球公平正义。1960年在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斗争中，毛泽东向该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表示，中国坚定站在非洲一边。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亲自慰问遇刺的恩克鲁玛总统，并带去了毛泽东的亲笔书信，表达了中国政府支

^① Li Xinfeng and An Chunying, *The Changing World and Africa*, Singapor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2, p. 341.

持恩克鲁玛总统的决心。1965年，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对其提出的援建坦赞铁路请求慷慨应允。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侠肝义胆和真挚情怀，赢得了非洲国家人民的拥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用“全天候朋友”形容中赞关系，1988年邓小平接见他时，卡翁达又说“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是真正无私的帮助，我们为有中国这样的朋友而骄傲”。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也曾强调“对华友好永远是坦桑尼亚对外政策的基石”。^①

无论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和非盟会议中心、助力国际社会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与新冠疫情，还是非洲国家无私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灾害后积极向中方捐款，都体现了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习近平在解释中非友好历久弥坚、永葆活力时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真诚友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非永远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② 这样饱含深情的表述在中国对非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比比皆是，是中非关系深情厚谊的真实写照。2013年提出的“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高度凝练和概括了中国的对非政策理念，是中国对非情谊的又一表达。中国以互帮互助、共同发展、亲诚惠容、互利共赢的逻辑代替了以往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强权思维和势力范围思维，^③ 将情感逻辑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个坚持”、“五不”原则等国际关系规范有机结合在一起，开创了对非洲兄弟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友谊外交。

二 中国式现代化对非洲发展的启示

世界是一个共生、共建、共享的有机整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④ 有国外学者曾言，基于当下发展的情境，中国的成功给了

① 戴严：《邓小平外交思想与中非关系》，《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8月2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295~296页。

③ 吴传华：《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地位、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第19页。

④ 黄宝成、周育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特质、原则遵循、实践方略》，《经济问题》2022年第2期，第11页。

非洲大陆领导人一个替代西方领导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方案的选择。^①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做出了很好的示范。^② 在很多方面,诸如重视减贫发展、关注工业基建、着眼科技教育、挖掘自主动力等,非洲与中国都各自采取过不同措施,但因国情不同,各领域投入的力度、方式不同,故取得的成效也不同。但相对于西方的发展理念,与非洲国家具有同样历史遭遇、基本国情相似且都是后发国家的中国,其现代化探索经验对非洲国家来说显然更具有借鉴意义。

(一) 以减贫发展为首要

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终结贫困都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基本要求,是实现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内容。受贫困羁绊的发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③ 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④ 中国带领规模巨大的人口创建了卓有成效的扶贫减贫模式,提前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长期且没有完全根除的贫困是使中国领导人如此关注发展减贫问题,并对非洲贫困感同身受的重要原因。国际社会关于“非洲崛起”的言论时有响起,但非洲大陆的发展前景仍面临现实挑战:贫困依旧影响着近4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他们每天只能靠着不到1.25美元的生活成本生存;^⑤ 2022年世界上最贫穷的25个国家中,非洲占了21个,最穷的前9个国

① Israel Nyaburi Nyadera, Billy Agwanda and Michael Otieno Kisaka, “Beyond the Yuan: Rethinking China’s Attractiveness to Africa”, *China Report*, Vol. 56, No. 4, 2020, p. 442.

② 万字、刘军国:《中国是非洲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好伙伴》,《人民日报》2023年6月6日,第3版。

③ 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5,第2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第7页。

⑤ Garth le Per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osting Trade Opportunities for Sub-Saharan Africa”, *Trade Hot Topics*, Iss. 143, 2017, p. 1.

家都在非洲;^①乌克兰冲突导致数百万非洲人陷入贫困,且使非洲债务高风险国家的比例也有所提升(预计2023年将从53%提升到61%)^②。对非洲国家来说,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减贫,减贫是发展的第一步,舍此谈发展就是误导,撇开民生谈民主更是不负责任。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中非减贫合作的有力推动者,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中,双方就将减贫发展列为重要议题。2014年《中国和非洲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出台,成为指导中非不断探寻新时代下减贫新形式与新内容的纲领。中国还十分重视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王毅在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表示,中方将免除非洲17国截至2021年底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23笔。中方也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框架下的对非减债行动,呼吁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在减轻非洲国家债务负担方面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二) 以工业基建为重点

工业化进程涉及社会经济复杂的全面转型,一直是结构转型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的支柱。多年来,非洲领导人重申促进工业发展的决心,将其作为实现经济有效转型、社会可持续变革的手段。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已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通过自身探索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对工业化进程的理解不同于西方,具有独特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促进了中非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合作,并为同类产品制造商提供了横向聚集的基础设施。^③作为国家贸易交流与产能合作发展的基础,设施联通对进行有效配置资源、提高生产力具有积极意义,^④可大大降低商品交易成本和使用成本,产生经济回报。现代化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铺垫,“道路通百业兴”“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国脱贫致富的成功经验,且设施的扩散效应仍在继续凸显。非洲是世界上面积第二

① Poorest Countries, “Top 25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2022”, <https://poorest-countries-in-the-world.com>.

②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23”,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3, pp. 59–60.

③ Tang Xiaoyang, “Different Strategy”,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307/19/WS64b71f79a31035260b8172b9.html>.

④ Courage Mlambo, Audrey Kushamba and More Blessing Simawu, “China-Africa Relations: What Lies Beneath?”, *The Chinese Economy*, Vol. 49, No. 4, 2016, p. 262.

大的大洲,基础设施发展有助于推动该大陆各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融合,减少区域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据调查,仅改善基础设施每年就可能使非洲地区的增长率至少提升 1.2 个百分点。^①但非洲国家依靠自身财政难以解决基建投入问题,而在长期同西方国家的合作中该问题得不到重视。^②习近平曾表示要“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支持,促进共同繁荣”。^③加之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一项风险高、周期长、见效慢的投资,需要稳定的环境以促使其良好发展。中国具有平稳的社会环境,可确保项目持续推进。然而,在许多非洲国家因政治动荡、战乱纷争,很多项目难以施为。另外,在中非基础设施建设中最困难的往往不是工程技术,中国官员和开发商更需慎重考虑政治、法律制度、公众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带动下,中非在交通、电力、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受到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欢迎和支持,成为助力非洲现代化建设、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三) 以科技教育为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在追求国家富强的同时造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推动人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④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筑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人力基础。非洲也不断加强对教育的重视,其《2063 年议程》明确提出要通过创新、科学和技术革命来发展人力和社会资本,非洲大陆教育战略(CESA)旨在调整非洲的教育和培训系统,以培养具有促进国家、次区域和大陆可持续发展所需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人才。但仍有众多非洲儿童在能够接受教育的边缘徘徊,2019 年大约有 1.05 亿小学和中学年龄段的儿童失学,这是全世界该年龄段失学儿童数量的 41%。非洲每 10 万人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平

① World Bank Group, *Africa's Pulse*,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7, p. 67.

② 杨宝荣:《“一带一路”携手非洲共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第 35 页。

③ 习近平:《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 3 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23,第 27~28 页。

均人数为 762 人，而全球为 801 人。^① 在非洲，仅仅取消学费往往不足以保证最贫困家庭的儿童上学，机会成本、周边学校或学习中心不足、普遍的社会规则、冲突和安全问题等都应被纳入考虑范围——这些都是中国需要特别注意的。但总体而言，中非对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共识，推动双方科教合作不断深化，并呈现学生规模日益扩大、教育领域不断拓展、教学形式趋于多样、培育层次逐步提升等特点。中国通过为非洲国家修建中小学校舍、提供教学物资，为其量身打造本地教材，支持非洲基础教育；通过援建大学图书馆、教学区，开展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加强科研合作与师生互访，推动文凭和学位互认，发展高等教育；积极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使孔子学院成为中非教育合作的一个优质品牌，培养了一批非洲的“中国通”。这些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使非洲的人口资源转化为了人口红利，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智力支持。

（四）以自主发展为动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外来力量拯救自己命运的，西方援助既非没有代价，也非国家发展的捷径，自主发展才是根本动力和切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悖论”，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走上了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② 对于饱受外部干涉的非洲国家来说，发展更应是从发展实际出发、创造发展条件、实现自主发展的过程。非洲学者莫约明确提出，过去数十年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不仅无效，而且更是造成非洲发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居高临下的恩赐式支配性外援，给非洲发展带来结构性障碍……既引发深重腐败，又断送了非洲自主发展的可能与机会。^③ 加纳的非洲—中国政策与咨询中心执行主任保罗·弗林蓬认为，“默认情况

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非洲联盟委员会：《非洲教育转型：基于循证的概况简述及对长期改进的建议》，<https://www.unicef.org/media/107971/file/Africa%20Education%20Report%20Summary%20CH%20.pdf>。

② 颜英、何爱国：《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理论与现代化》2023年第2期，第85页。

③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p. 49.

下,几乎在非洲每个国家,我们的对话都是西方主导或策划的。但由于现在信息获取的便捷,人们可以真正欣赏不同的声音和新的视角”。^①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单凭“拿来主义”,而应在比较他国经验与本国实际后进行取舍。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吸取国外经验教训后进行的本土化改造,非洲的现代化道路发展应不外如是。中国政府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其具有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并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这意味着政府能够集中力量规划和建设大量大型项目。在一些非洲国家,政府机构实际上可能缺乏必要的权力和资金,无法无缝地进行总体规划。且许多非洲传统的社区结构仍然是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往往不一致。^② 故中非在交流合作中,应全方位考虑实际差异,审慎借鉴发展经验。中国领导人呼吁发展中国家要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习近平在出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非洲时就指出要“加强同非洲国家在农业、制造业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③ 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再到“九项工程”,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激发非洲自主发展潜力逐渐成为中非合作的核心重点与目标方向。

三 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中非发展 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在探索进程中不仅致力于实现自身发展,而且注重并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④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须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打造更加

① “China’s Modernization Success Inspires African Countries to Seek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s”, <https://northafricapost.com/71702-chinas-modernization-success-inspires-african-countries-to-seek-independent-development-paths.html>.

② Wade Shepard, “Why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Won’t Work in Africa”,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19/10/31/why-chinas-development-model-wont-work-in-africa/?sh=1e2175b657af>.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第307页。

④ 鲁明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与世界意义》,《行政论坛》2021年第4期,第9页。

紧密的中非发展伙伴关系、促进中非农工商贸产业融合、增强中非可持续发展潜力、提升中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能力。

（一）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发展伙伴关系

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的命运相互交织，亦使各国的现代化联系更为密切。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也无疑增强了非洲国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信心。中非顺应时势变化，在合作中既注重抓好各国间的双边关系，亦关注处理好多国间的多边关系，为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

一是加固双边伙伴关系。非洲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支持方。截至2023年6月，53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52国以及非盟委员会已经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据统计，中国已与21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建立双边委员会、外交磋商或战略对话机制，同51个非洲国家建立经贸联（混）合委员会机制。^①中非双方须继续完善各项倡议与各项国际倡议之间的协调机制，推进非洲大陆一体化和次区域组织一体化建设的协调发展，签订具有针对性的合作协定、谅解备忘录，实现发展利益最大化。

二是加快多边关系发展。中非设立了一系列更为专业化的平台进行深入合作：中非企业家大会、中国—非洲联合工商会、中非跨境电商平台等在不同领域搭建了中非对话平台；中非发展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成为促进中非投融资的重要平台，为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注入新鲜动力。作为中非区域间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是由中国面向一个大洲创设的第一个国际机制，虽然在推进中非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论坛机制的制度化建设还有待加强，^②需对论坛后续机制进行优化。

三是加强发展议题对接。为更快、更好地推动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双方在中非合作中不断加强发展思路和理念对接，不断丰富议题形式。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与非洲《2063年议程》高度契合：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行动导向”，关注的八大重点领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人民出版社，2021，第12页。

^② 郭佳：《中非论坛：务实合作的长效机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0日。

域几乎囊括非洲所有亟须发展的优先领域;《2063年议程》确定了非洲发展的核心框架,制定的各类发展计划与全球发展倡议暗合。

(二) 促进中非农工商贸产业融合

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将会直接对全球经济发展基本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现在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伙伴,双方通过经贸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巩固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为该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

一是深化农业合作。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统计,在45个需要粮食援助的国家中,非洲占有33个。^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业增长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由非农业增长带来的同等幅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相比,在减轻贫困方面的作用要高11倍。^②农业作为中非合作的传统领域和重要利益交汇点,双方可依托在非各类经贸合作园区,推动涵盖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合作,共同提高非洲农产品本地化加工能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例如,中阳建设集团在赞比亚投资建设的中阳生态农业产业园,成为中非农业合作领域的典型示范园。

二是升级工业合作。工业化是非洲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前提,非盟在《2063年议程》中将实现工业化视为非洲经济转型的引擎。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双方开展工业化合作的各项条件均趋于成熟。中方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尊重东道国市场规则的基础上,赴非洲国家建设和运营境外经贸合作区、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鼓励中方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开展进口替代型和出口主导型合作;支持中企赴非投资,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并开展本土化经营,助力非洲产业升级;帮助非企学习更多的商业理念与管理模式,提升非洲国家经济多元化程度和自主发展能力。西电埃及是中国技术助推埃及本土制造业发展的缩影,一批类似企业在当地设立生产制造中心,聚集成团、培强做大,成为加快当地工业化速度的重要力量。

^① “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Quarterly Global Report No. 1”, FAO,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c4665en>.

^② 安春英:《中非减贫合作与经验分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142~143页。

三是优化投资贸易。就贸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非贸易总额累计超2万亿美元，中国始终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①2022年，中非贸易额达2820亿美元，同比增长11.1%。中非贸易在实现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结构也得到同步优化。中方设立中非经贸博览会，组织贸易促进团去非洲采购，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举办“非洲好物网购节”等活动，大力推介非洲优质特色产品，贸易渠道不断拓展。2022年，中国对非新增直接投资34亿美元，截至同年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70亿美元，是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目前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有3000余家，几乎在所有非洲国家都进行了投资，投资方式更加多样、投资主体日益多元、投资平台逐步升级，贸易投资融合发展态势良好。

（三）增强中非可持续发展潜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不冲突，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②中非从思想和行动上双管齐下，不断激发绿色潜力，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是突出绿色发展理念。非洲“自然、和谐、人道、共有、共享”的传统价值观与中国的“天人合一”“和合包容”传统文化精髓高度契合，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绿色基因”提供了生长土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为非洲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绿色道路提供了有益启示。2021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首次发布了《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双方一致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明确表示“助力可持续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二是强调清洁能源开发。大量燃烧化石能源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传统油气与煤炭资源的消费量占非洲能源消费量的92%，故开发清洁能源，减少传统化石能源亟须提上非洲发展日程。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已

^① 除2015~2016年受部分国家金融、经济危机交织出现，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影响，2019~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外，中非贸易额总体保持稳定增长。

^② 楼宇：《拉美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认知》，《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第20页。

经在光伏和风电等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先优势,^①为中非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支持者,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实现“公正过渡”计划,助力其完成从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到可再生能源的过渡。^②从埃塞俄比亚的阿达马风电场与阿伊萨风电站,到乌干达的卡鲁玛水电站,再到肯尼亚的加里萨光伏电站,中国和非洲已开展了上百个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的合作,为解决传统能源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提供了新方案。

三是促进绿色科技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工业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环境所造成压力的关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其需具备“硬件”(包括技术基础设施)和“软件”(包括生态创新技能、专业知识和商业模式)两个关键属性。^③中非积极通过合作开发更为系统、高效的创新技术,将“资源困局”转变为“发展新局”,共享绿色发展机遇。中方可帮助非洲构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制定多种危险预警与早期行动计划,提升非洲国家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信息的采集与监管能力。

(四) 提升中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能力

如何实现发展?关键是自身拥有相应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从被动、外源式、单一的现代化走向了主动、内生性、全面高质量的现代化,其“伟大意义绝不仅限于中国,它还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④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操作性。

一是数字经济赋能发展。数字产业在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消除“数字鸿沟”。截至2021年,超过15个非洲国家的17个城市中的1500多家企业选择中国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伙伴,29个国家选择中国企业提供的智慧政务服务方案。^⑤中国

① 张建新、朱汉斌:《非洲的能源贫困与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6期,第43页。

② African Union, *African Union Green Recovery Action Plan (2021-2027)*, Durban: AU, 2021, p. 14.

③ Nicholas Ozor and Alfred Nyambane, *Eco-innovation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Nairobi: ATPS, 2021, p. 12.

④ 汪青松、马拥军:《积极探索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简评》,《人民日报》2017年7月4日,第7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人民出版社,2021,第23页。

企业积极参与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洲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行业的发展，还通过数字化外贸的方式与非洲本土分销商结合，进一步拓宽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销路。目前，已经有数十家中国企业创建的跨境电商电子商务平台进入非洲市场，加快布局“基地+展贸+营销”跨境电商供应链体系。^①

二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非洲大陆拥有 14 亿人口，将数量众多的人口转变为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是非洲国家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为满足近年来非洲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服务中非发展，中方院校在非洲多国开展了不同类型的培训班，并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和经济区创造一个良性的“技术—人才—就业”循环来推动非洲的进一步工业化。^② 通过开设鲁班工坊，援建职业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中心，中方为非洲青年提供实用技术培训，有力促进了当地的职业人才培训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冠疫情后，中非都意识到了医卫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双方正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培养体系。

三是激发就业市场活力。据联合国统计，全球 17% 的人口生活在非洲，其中 15 岁以下的比例为 40%，30 岁以下比例高达 70%，这意味着非洲有着巨大的劳动力与消费市场。《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指出，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各类企业超过 3500 家，聘用非洲本地员工比例超 80%，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例如，中国广核集团在纳米比亚参建的湖山铀矿项目为当地社区创造了 6000 个临时职位和 2000 多个长期职位；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沿海铁路建设创造了 5 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 15 万个间接就业岗位，而铁路的运营过程也创造了 2 万~3 万个稳定的就业岗位。^③ 随着大批中非合作项目的落地，中方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同非洲伙伴开展合资合作，在基建项目执行和开发各环节雇用更多本地工人，开拓其就业空间。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是世界各国

-
- ① 肖瑾、徐薇、李雪冬、张巧文：《“一带一路”与非洲大陆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的思考》，《非洲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276 页。
- ② He Wenp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eijing’s Vision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 6, No. 1, 2020, p. 49.
- ③ Wang Zhizhang and Zheng Shiyan,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nti-Poverty Industrial-Capac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Vol. 5, No. 4, 2020, p. 53.

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现代化。^① 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复杂的工程，符合中非发展合作现状，契合中非发展优先关切，是中非合作的深化、拓展与升级。在逆流涌动的全球发展态势下、在风高浪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对于“发展依然是最大的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② 的中国和非洲而言，坚定支持彼此的发展利益，打造发展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非发展的福音，也为推动南南合作与全球发展提供了方案。

【责任编辑】王珩

① 贺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认同：理念与路径》，《湖南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② 刘鸿武：《中非发展合作与人类现代文明的再塑造》，《国际问题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19 页。

ic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not balanced, and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is on the low side. In particular,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vast number of new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China is the motherlan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key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uty-bound i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expansion of resource supply,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current good situation, actively plan and accurately allocate resources to buil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s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support localized Africa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to carry ou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guid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enterprises in Africa to participate in running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n Africa; Education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for Ethnic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and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Li Dan, Wang Lijun / 191

Abstract: Development is the eternal pursuit of human society, and moderniza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global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Af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logically consistent with China in history, reality, theory, emotion, etc.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untries needs to prioritize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as the foc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s the support,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buil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Africa's developmen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explore in concrete practice, forge a closer China-Africa'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Africa's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dustries, enhance China-Afric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enhance China-Africa's ability t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Africa's Development;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On th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Disputes in Africa

Li Zuhua, Duan Zhizhuang / 209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foreign investment has also moved to the world rapidly, the amou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f China has leapt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t pres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African countries have increasingly shown great market potential. They are regarded as a hot spot for investment by investors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key area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vest abroad. However, there are unfavorable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turmoil, frequent terrorist activities and changeable laws in Africa, which bring many political and legal risks to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have sprung up. How to resolve disputes effectively and maximize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investor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China needs to face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solve investment disputes: political means, arbitration and domestic litigation.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bove dispute relief measures have various disadvantag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ree ways of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path of Sino-African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establishing 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ith the judicial settlement of China-Africa investment court as the core.

Keywords: Sino-African Investment Disputes; Politic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hina-Africa Investment Court